

周作人與《古今》雜誌

張 鐵 榮

從一九四二年六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，周作人成了《古今》雜誌的撰稿人。《古今》雜誌是抗戰期間南方偽組織的重要文史刊物，汪精衛，陳公博，周佛海，梁鴻志等頭面人物，都是該刊的長期作者。分析周作人在《古今》雜誌發稿的來龍去脈及文章本身，研究周作人與《古今》雜誌的關係，對於認識抗戰時期的周作人是十分重要的。

一 關於《古今》雜誌

《古今》雜誌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創刊，初刊時為月刊，自第九期起改為半月刊，到一九四四年十月停刊。這份在上海編輯的雜誌共出版了五十七期。

《古今》雜誌是以學術性，資料性為主的刊物，關於其辦刊宗旨，牠的《發刊詞》這樣說：

「古今中外，東西南北，形形色色，無奇不有。在幾千年的歷史中，世界上產生了多少英雄豪傑和名士佳人，發生了多少驚天動地和可歌可泣的事蹟！過去的都成史料，現在的有待紀錄，未來的則無從說起。總之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，世事滄桑，令人感慨不勝而已。所謂歷史，整個的就是一部人類的千變萬化和喜怒哀樂的紀錄。我們——全世界的人們——現在都是這個時代中某一喜劇或悲劇中的某一主角或配角。說「吾人生不逢辰丁茲亂世」等話，似乎太悲觀了一些，但如果說「我們何幸而生在這個偉大的時代」等話，則又未免太英雄氣概了吧。

同人等都是些一介書生之類，一面雖是憂國傷時，可是一面却又是力不從心。說句老實話，我們除了一枝筆外簡直別無可以貢獻於國家社會之道。因此，我們就集合了少數志同道合之士，發起試辦這個小小的刊物，想在此出版界萬分沉寂之時，來做一點我們所自認尚能勉為其難的工作。

我們這個刊物的宗旨，顧名思義，極為明顯。自古至今，不論英雄豪傑也好，名士佳人也好，甚至販夫走卒也好，祇要其生平事蹟有異乎尋常不很平凡之處，我們都極願盡量搜羅獻諸於今日及日後的讀者之前。我們的目的是在乎彰事實，明是非，求真理。所以，不獨人物一門而已，他如天文地理，禽獸草木，金石書畫，詩詞歌賦諸類，凡是有其特殊的價值可以記述的，本刊也將兼收並蓄，樂為刊登。總之，本刊是包羅萬象，無所不容的。

我們願闢此小小的園地，以供同好諸公的耕耘。」

《古今》的主編兼社長是朱樸，由於朱樸每月往來於南京和上海之間，與汪偽上層人物拉關係，不能傾全副精力從事《古今》編輯工作，因此自第三期起，特聘周黎庵為該刊專任編輯，朱祇任社長。

朱樸到底是怎樣的人物，我們不能不敘述一下。

朱樸於一九〇二年生於江蘇省無錫縣景雲鄉全旺鎮，小學畢業後換了幾個中學，後放入上

海的中國公學，一九二二年畢業於中國公學商科。開始任職於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社，一年以後又到北京英商麥加利銀行華帳房任職。一九二四年加入國民黨，此人是個不安於做事之徒，心猿意馬。一九二六年回上海，由於他是學商出身，當上了上海市農工商局的合作事業指導員。一九二八年被國民黨中央民衆訓練委員會派往歐洲，調查合作運動。在巴黎認識了林柏生，由林介紹認識了汪精衛。自攀上汪精衛後，他便感覺到了登龍有望。不久汪派他與林柏生等人創辦《南華日報》，一九三〇年夏又隨汪去北平，任海外部祕書，同時並與曾仲鳴合辦《蔚藍畫報》。一九三一年汪在廣州主持非常會議，他被任命為文化事業委員會委員。由於朱樸對出國一直興趣濃厚，所以汪精衛對他也小施以祿，一九三四年六月以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專員的身份，派他出國考察兩年，因為該會經費不充，所以又給了他一個駐丹麥使館祕書的職務，可謂關懷有加。一九三七年春汪提拔他當中央政治委員會土地專門委員併兼上海《中華日報》的主筆。這一年的秋天“八·一三”事變發生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汪精衛的“豔電”發表，公開分裂祖國投降事敵，朱樸被秘密派往上海，從事宣傳工作。經過一兩個月的籌備，汪偽方面在上海的第一個刊物《時代文選》出版。同年八月朱樸出任汪偽中央監察委員併担任偽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。一九四〇年被任命為偽交通部政務次長，偽中央黨部組織部副部長，偽中國合作學會理事長。朱樸本是一個無恥文人，看他從青年時代翻來復去地調換工作，便可知此人之情性。一九四一年，因偶然原因他的妻子與長子先後病死，再加之他出任的偽職和自己所想的頗有距離，所以他萬念俱灰，終日彷徨，喪失了做任何事的勇氣。關於籌辦《古今》，朱樸是這樣表白的：“我因心中哀痛，不能自己，遂決定試辦這一個小小刊物，想勉強作為精神的排遣”①。辦一個雜誌在精神上當然可以排遣一下，但像他這樣的人，把辦刊物做為幌子以施展登龍求鳳術也說不定。因為從第三期《古今》始，他便請來了周黎庵專門負責編輯，而他自己則來往於上海南京的汪偽上層之間。一九四二年四月朱樸走訪梁鴻志，從此便認識了梁的女兒，這是他們交往的開始，此後梁鴻志的文章，日記等在《古今》上頻頻發表，可見朱樸去梁家“邀稿”之勤。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出版的《古今半月刊》第四十期上，朱樸發表了《樸園短簡》，這是一封致梁鴻志女兒梁文若的情書，充滿肉麻的文字，併寫明是“第一信”。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出版的《古今半月刊》第四十三、四十四期合刊上，發表了文載道寫的題為《三十三年三月三日三時》的記實通訊，詳細介紹了朱梁結婚的場面實況。一個文史雜誌，併自我標榜：“我過去辦刊物，向來抱‘甯缺毋濫’主義，重視‘質’的成份，而輕視以‘量’炫人。古今出版於目前這個空谷足音的時代，尤應堅守素志，決不遷就時俗；這一點我自當特別注意，以期不負周先生（佛海——引者註）之厚望的”②。如今刊物辦到這個份兒上，也真够可以的了，由此亦可見抗戰時期漢奸文化之一斑。朱樸之登龍求鳳目的達到一半兒，半年之後《古今》也終於宣告關門。

《古今》的經常執筆人有：

汪精衛，周佛海，陳公博，梁鴻志，周作人，瞿兌之，徐一士，徐凌霄，謝剛主，吳湖帆，朱樸之，吳翼公，樊仲雲，趙叔雍，陳乃乾，沈啓元，謝興堯，周越然，紀果庵，文載道，沈爾喬，朱劍心，鄭秉珊，馮和儀，龍沐勳，金雄白，予且，袁殊，南冠，白衡，小魯，笠，堪樁，冠，銖庵，左筆，心民，識因，經堂，微言，何淑，黃胄，拙鳴，夏曼，薑公，何心，何戡，南山，白水，志雄，蘇青，蕘公，堪隱，周黎庵，周幼海，諸青來，李宜偶，柳雨生，金息侯，汪向榮，何海鳴，陳寥士，胡詠唐，周樂山，楊鴻烈，陳旭輪，石順淵，葉雲君，趙正平，江亢虎，楊靜齋，錢希平，周炎虎，陳耿民，張素民，李耕青，姜賜蓉，

魯昔達，周夢莊，顧鳳城，張愛玲等。

縱觀〈古今〉，有如下幾點特徵：

(一) 偽政治的文章，宣傳投降主義的所謂“和平運動”，與汪偽上層人物的活動及歷史。如周佛海的〈四游北平雜感〉，〈廣州之行〉，〈武漢追憶鱗爪〉，〈我的奮鬥〉，〈自反錄〉，〈扶桑笈影溯當年——一個共產黨員的追憶〉。陳公博的〈上海的市長〉，〈了解〉，〈偏見〉〈我與共產黨〉等。其中周佛海的〈扶桑笈影溯當年——一個共產黨員的追憶〉與陳公博的〈我與共產黨〉兩篇長文，提供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史料，值得重視。但其主旨則是用個人過去的歷史來掩蓋現實的醜惡。爲了宣傳漢奸政治，美化漢奸頭面人物的文章也很多，這方面有：周作人的〈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序〉，周佛海的〈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序〉，李宜侗的〈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序〉，左筆的〈記周佛海先生〉，經堂訪問梁鴻志的〈記爰居閣主人〉，朱樸的〈記（周佛海，陶希聖主持下的）蔚藍書店〉，龍沐勳的〈讀陳公博先生〈我的詩〉〉，朱樸的〈〈往矣集〉日譯本序〉，周毓英的〈讀〈往矣集〉後感〉等。再有就是發表汪精衛的舊文新作，以擡高雜誌的身價。其中有汪精衛的〈故人故事〉，〈重刊隨山館詞簡編後序〉，〈讀陶隨筆〉及一些古詩。

(二) 宣揚色情，蠱惑青年的無聊文章。這可以說是當時日治下敵偽雜誌的通病，也是維持敵偽統治的手段之一。〈古今〉雖是文史雜誌，但也不能避免。如余牧的〈談眉〉，兪忍的〈女人頌〉，張素民的〈談怕太太〉，无儷的〈談求婚〉，兪忍的〈談〈戀愛至上〉〉，楊絢霄的〈論〈兩性〉〉，周越然的〈西洋的性書與淫書〉，予且的〈妻財子祿〉，徐一士的〈狀元與美人〉，識因的〈大酒缸與小飯館〉，鑫堯的〈婦人生髮〉，五知的〈雅片煙具考〉等均屬這一類文章。〈古今〉雜誌中論述〈孽海花〉的文章奇多，就是在此類清末小說的研究文章中，也是過多論及軼聞艷事，表現出低級庸俗的趣味。

(三) 傳記，軼事，掌故，秘史之類的文章。這類文章在〈古今〉中非常之多，這也是當時文人逃避現實的一種辦法。周作人的文章均屬此類。不過他在此耍了點小聰明，著文時有自己目的，下面一部分我將專門談這個問題。

二 關於周作人發表的文章

周作人在〈古今〉雜誌上共發表了十九篇文章，這對於抗戰時期他所寫的文章來說併不算多。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章均比較長，尤其在那個特殊時期，這些文章對於研究他的思想和文學活動來說，不可謂不重要。

爲了讀者研究方便，請容我把這些文章按時間排列如下：

1. 〈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序〉，第四期，一九四二年六月；
2. 〈藥味集·序〉，第五期，一九四二年七月；
3. 〈記蔡子民先生的事〉，第六期，一九四二年八月；
4. 〈懷廢名〉，第二十，二十一合期，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；
5. 〈舊書回想記(一)〉，第二十七，二十八合期，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；
6. 〈舊書回想記(二)〉，第二十九期，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；
7. 〈舊書回想記(三)〉，第三十期，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；

8. 〈舊書回想記四〉，第三十一期，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六日；
9. 〈俞理初的著書——舊書回想記補遺之一〉，第三十八期，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；
10. 〈陶集小記——舊書回想記補遺之二〉，第三十九期，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；
11. 〈甲申懷古〉，第四十三，四十四期合刊，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；
12. 〈過狼的故事〉，第四十五期，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；
13. 〈我的雜學(一)〉，第四十八期，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；
14. 〈我的雜學(二)〉，第五十期，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；
15. 〈我的雜學(三)〉，第五十一期，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；
16. 〈我的雜學(四)〉，第五十二期，一九四四年八月一日；
17. 〈文抄序〉，第五十四期，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；
18. 〈我的雜學(五)〉，第五十五期，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；
19. 〈女人的文章〉，第五十七期，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。

周作人在〈古今〉雜誌上發表文章是從吹捧汪精衛開始的。

一九四二年五月初，周作人曾作為汪精衛的隨員，參加偽“滿洲國”十周年的慶典活動，併一同“謁見”了傀儡皇帝溥儀。此次活動結束後，作為代表團的成員，周作人隨汪精衛一行乘飛機去南京。在南京他也頗風光了一陣，每日出沒於陳公博，江亢虎，梁鴻志，褚民誼，林柏生等頭面人物的“招宴”之中，他出席汪精衛六十歲生日宴會的第二天，還專門被汪精衛請去參加家宴，真可謂備受青睞。發表於同年六月出版的〈古今〉第四期上周作人的〈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序〉一文，對汪精衛大加吹捧，說什麼：“中國歷史上此種志士仁人不少概見，或挺身犯難，或忍辱負重，不惜一身以利衆生，為種種難行苦行，千百年後讀其記錄，猶能振頑起懦，況在當世，如汪先生此錄，自更令人低回不置矣。抑汪先生蒙難不止庚戌，民國以後，乙亥之在南京，己卯之在河內，兩遭狙擊，幸而得免，此皆投身飼餓虎，所捨不祇生命，且及聲名，持此以觀庚戌之役，益可知其偉大，稱之為菩薩行正無不可也”^③。周作人的此文很可能是在南京祝壽時，送給朱樸發表的。因為來往於滬寧之間的朱樸，這樣的機會不能不鑽營；再從〈古今〉雜誌本身來看，周的此文排在第四期首篇，但在同期的〈編輯後記〉中竟毫無提及，這在該刊編輯慣例中是很少有的，由此可見文章很可能是臨時插進去匆忙發表的。不知為何，此文周作人在後來一直沒有收進他結集的書中去，這可能與他一貫對吹捧官僚政客的自由主義精神正相違也未可知。不過此時的知堂老人確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。

周作人在〈古今〉雜誌上發表的第二篇文章是〈藥味集·序〉，這篇序言已於同年三月隨着書的出版為世人所知了。為什麼過了四個月以後又寄到南方再單獨發表一次呢？細讀此文便可發現其中的奧妙。周作人說：“若言思想，確信是儒家正宗。昔孔子誨子路：‘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’。鄙人向來服膺此訓，以是於漢以後最佩服疾虛妄之王充，其次則明李贄，清俞正燮；於二千年中得三人焉。疾虛妄的對面是愛真實，鄙人竊願致力於此，凡有所記述，必須為自己所深知確信者，才敢着筆，此立言誠慎的態度，自信亦為儒家所必有者也。因此如說此文章思想皆是國粹，或云現代化的中國固有精神，殆無不可”。在這裏周作人強調儒家正宗的中國傳統文化，對自己的文章懷有信心，公開表明自己的文章，思想皆國粹或云現代化的中國固有精神。此文與同年九月在偽華北作家協會成立大會上的〈訓詞〉，及十一月寫的〈中國的思想問題〉等文，在思想內容上是完全一致的。這可以說是周作人鼓吹“儒家思想中

心論”的開始。身為“知日派”的他，不會想不到當時膨脹得發昏的日本軍閥及其幫閑文人的反應，他把這篇序言投寄〈古今〉雜誌，再發表一次，其用心是頗值得深思的。我們在了解了〈古今〉雜誌的背景之後，對此大概不難理解吧。果然第二年他遭到了片岡鐵兵的攻擊，被斥為“反動老作家”，當然這是後話了。在〈古今〉第五期的〈編輯後記〉中，編者這樣寫道：“周作人先生的〈藥味集〉，係由北平新民印書館印行，為周先生最新的結集，其中頗多南中讀者所未見的文章，惜乎南中沒有法子可看到。本期所刊的是該書的序文，頗可見周先生近來的思想態度，文雖短却是值得重視的一篇佳作”。從這個頗多贊譽之詞的〈編輯後記〉中，我們可以知道周作人的目的是達到了。

但是周作人似乎還不滿足，緊接着該文後，在下一期又發表了一篇長文——〈記蔡子民先生的事〉。他借回憶蔡元培掌北大的舊話，又一次強調自己的儒家思想中心論的主張，他這樣寫道：

“蔡先生曾歷任教育部，北京大學，大學院，研究院等事，其事業成就彰彰在人耳目間，毋庸細說，若撮舉大綱，當可以中正一語概之，亦可稱之曰唯理主義。其一，蔡先生主張思想自由，不可定於一尊，故在民元廢止祭孔，其實他自己非是反對孔子者，若論其思想，倒是真正之儒家也。其二，主張學術平等，廢止以外國語講書，改用國語國文，同時又設英法德俄日各文學系，俾得多了解各國文化。其三，主張男女平等，大學開放，使女生得入學。以上諸事，論者所見不同，本亦無妨，以我所見，則悉合於事理，若在現今社會有所扞格，未克盡實行，此乃是別一問題，與是非蓋無關者也。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為既多以思想主義為本，因此我以為他一生的價值亦着重在思想，至少當較所施為更重。蔡先生的思想，有人戲稱之為古今中外派，或以為近於折衷，實則無寧解釋兼容並包，可知其並非是偏激一流，我故以為是真正儒家，其與人不同者，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歐學問，使儒家本有的常識更益增強，特此以判斷事物，以合理為止，故即可目為唯理主義也”。

此處亦承上文思想，借懷念蔡元培再次強調儒家思想正宗。而此文總結蔡元培主持北大的三個特色的前兩點頗值得注意，那就是“主張思想自由，不可定於一尊”和“主張學術平等，廢止以外國語講書”。在當時已經沒有思想自由，學術上沒有平等可言，一部分學校改用日本語教學的北京，他講這番話是什麼意思呢？抗戰時期的周作人在思想上是充滿矛盾的，他雖然照例不誤地每天“上午十時就到教育總署辦公”^④，充當傀儡，但他本身是一個知識份子，一坐到書桌上寫文章時，他又成了自由主義者。他這個人一生的特點就是總想搗點小亂子，紳士性格與流氓性格相互作用，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“兩個鬼”的心理特徵。所以，他能寫出上面那種堅持己見的文章；他也能在偽教育總署，當着一些日本人的面說：“日語辭典裏查不到實際應用着的語彙”^⑤；他也能揜護一些地下工作者……。但是，已失的大節是所有這些能够補償得了的嗎？不過，周作人的這種兩面性，確實給我們後來的研究者帶來了一定的難度。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潤一郎曾經這樣說：“我弄不清先生（指周作人——引者註）作為一個愛國者，今天仍留在北京與日本方面合作，盡着重要的職責是基於何種思想”^⑥。連谷崎潤一郎這樣的人都“弄不清”，更何況片岡鐵兵呢！

又過了半年多一點的時間，周作人忽然懷念起他的學生來了。這在周作人的一生中是很少有的現象。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，他寫了〈懷廢名〉一文，發表在同年四月出版的〈古今半

月刊》第二十，二十一期合刊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一年的二月四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改組，大年三十他們共署辭呈；春節剛過的大年初六上午，周作人便得到了他的辭呈照准的消息，而別人都是例行公事照常當官。周作人當然深受刺激。敵偽官場上的鉤心鬥角固然是原因之一，但朱深所說的“日方反對”也許不是假話。在這樣的時候他懷念廢名，固然頗有叙舊之情，但文外之意也是顯而易見的。他說廢名“到了民國二十五年，不知怎的忽然又將夫人和子女打發回去，自己一個人住在雍和宮的喇嘛廟裏。當然大家覺得他大可不必，及至盧溝橋事件發生，又很羨慕他，雖然他未必真有先知。廢名於那年的冬天南歸，因為故鄉是拉鋸之地，不能在大南門的老屋裏安居，但在附近一帶托跡，所以時常還可彼此通信，後來漸漸消息不通，但我總相信他仍是在哪一個小村莊裏隱居，教小學生念書，只是多‘靜坐深思’，未必再寫小說了吧”。在周作人筆下的廢名，雖然過着隱居的生活，但精神是何等地自由而又令人“羨慕”啊！而此時的周作人自己呢？他借懷廢名，抒發了自己對現實的冷嘲。此文他不在北京發表，還是寄給了南方的《古今半月刊》，這是他的智慧。

從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始一直到來年一月中旬，周作人在《古今半月刊》上連載了一組題為《舊書回想記》的文章。這是他在家讀書消遣時，寫的一組介紹或感想之類的筆記，在“小引”中他這樣說：

“近幾年來在家多閑，只翻看舊書，不說消遣，實在乃是過癮而已，有如抽紙煙的人，手嘴閑空，便似無聊，但在鄙人則是只圖遮眼也。舊書固然以線裝書為大宗，外國書也並不是沒有，不過以金圓論價，如何買得起，假如我有買一冊現代叢書的錢，也就可以買一部藕香零拾來，一堆三十二本，足夠好些日子的翻閱了，從前買的洋書，原來是出版不久的新本，安放在架上，有些看過早已忘了，有些還未細看，但總有點愛戀，不肯賣掉或是送人，看看一年年的過去，一算已是二三十年，自然就變成了舊書，正如人也變成老人一樣。這種在書架上放舊了的書，往往比買來的更會覺得有意思，因為和他有一段歷史，所以成為多少回想的資料。但是這也與書的內容有關係，如或有一部書看了特別佩服或歡喜，那麼歷史雖短，情分也可以很深，有時想到也想執筆記述幾行，以為紀念，新舊中外都無一定，今統稱之曰舊書，止表示與新刊介紹不同云耳。回想是個人的事，這裏免不了有些主觀與偏見，不過有一句話可以說明，無論如何總不想越過常識，蓋假如沒有這個來做燈標，讀新舊書都要上當，何況作文說話，更將大錯而特錯，則吾豈敢。日前會寫小文曰「書房一角」，已有做起講之意，而因循不果，今番似是另起爐灶，實則還是此意思，故重複話今亦不再說也”。

周作人在此聲明，他的讀書筆記都是說真話，“無論如何總不想越過常識”。細讀這二十八則（包括兩則補遺在內）回想記，發現他能站在書外把死書讀活，廣証博引足見淵深的學識與驚人的記憶。他對社會人生的看法雖時有流露，但常常穿插在大量的引文之中，初讀者不是馬上能夠體會得出來的，這也許正是周作人的追求也說不定，因為這樣也不會給他帶來什麼麻煩。

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出版的《古今半月刊》第四十三，四十四期合刊，在首要位置上發表了周作人的《甲申懷古》。文章一開頭周作人便說：“撫今追昔，樂少哀多”，他把明朝的滅亡歸結為如下兩點：“明朝甲申之變至少也該給我們一個大的教訓。民不聊生，為盜為亂，又受外誘，全體崩潰，是其一。士人墮落，唯知做官，無惡不作，民不聊生，是其二。這兩件事斷送了明朝，至今已是一百年，引起現在人的追悼，繼以嗟歎，末了却須得讓我們來希望，如巴

古寧所說，以後再沒有這些毛病了”。一九四四年正是中國農歷的甲申年，在那個時候紀念中國古代的亡國是什麼意思？人們讀此文之後會產生怎樣的心情？“民不聊生”，與“士人墮落”不也正是當時北平、南京的真實寫照麼？人們讀甲申之“古”是不會不想到“今”的。其實周作人的這一思想，還是〈中國的思想問題〉一文的觀點，也就是儒家的“仁政”。他可能是對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的“竭澤而漁”的掠奪暴行看得越來越清楚了。當時也正是“反動老作家”事件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，他寫此文是開始對片岡鐵兵進行全面反擊的一部份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在那個時候他認為中國文化“沒有被打倒過”，鼓吹儒家文化中心論，讓統治者施仁政等等，也是十足的阿Q精神，當時已陷入戰爭泥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哪能聽他的呢？他也許早就看出這一點了，所以他在這段話的前面先說：“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〈閉戶讀書論〉，其中有云，我始終相信〈二十四史〉是一部好書，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過去曾如此，現在是如此，將來也是如此。這話未免太陰沉一點了吧，我願意改過來附和巴古寧的舊話，說歷史的用處是在警告我們不要再如此”。這其實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慨歎而已。做為散文大家的周作人是很重視使用語言的，在總結甲申之變的兩條教訓之處，他為何兩次連續使用“民不聊生”這個詞呢？在文章結尾處他還說：“論史事亦殊危險”，這些都是頗值得回味的。

一九四四年三月六日，周作人寫了一篇題為〈遇狼的故事〉，發表在四月中旬的〈古今半月刊〉上。在文中他重提了十幾年前的舊事，他扶植一位文學青年研究民俗學，併給此人的〈大黑狼的故事〉一書寫了序言，不料此人因周作人不附和他的文學論而上門來鬧，打碎了周家南窗的玻璃。他痛心地寫道：“這大黑狼實在乃是他的學生，我被咬得有點冤枉，雖然引狼入室自然也是我的責任。去年冬天偶然做了幾首打油詩，其一云：山居亦自多佳趣，山色蒼茫山月高，掩卷閉門無一事，支頤獨坐聽狼嗥”。十數年前的舊事，一九四三年冬天作打油詩，一九四四年驚蟄寫這篇文章，這些都是為什麼呢？原來一九四三年八月片岡鐵兵在東京的“第二屆東亞文學者大會”上，猛烈攻擊他——這個中國的“反動老作家”。次年經過分析，他發現出賣他的人正是他的學生，這令他難以忍受併在思想上產生很深的痛苦。人處在受騙上當的痛苦之時，總是要回憶自己當初之悔的。果然九天之後，他發表了驅除沈啓元的〈破門聲明〉。他自己總結人生經驗時說：“依據我們自己的經驗，山野的狼是並不怎麼可怕的。最可怕的或者是狼而能說人話的，有如中山狼故事裏的那一隻狼”⑦。這篇文章較為細致地反映出周作人當時痛苦的心境，對於了解四十年代初、中期的他是很有幫助的。

從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至九月十六日，周作人在〈古今半月刊〉上連載了一組文章，題為〈我的雜學〉。在這二十節共兩萬多字的文章中，他把自己讀書的回憶、長期積累的有興趣的問題、自己在某一方面的專長等等，都簡單地記錄了下來。其中有：古文、小說、古典文學、佛經、外語、外國小說、神話學、江戶風物與浮世繪、川柳落語與滑稽本、兒童文學、俗曲與玩具、鄉土研究與民藝、性心理、葛理斯思想、醫學史妖術史、生物學、文化人類學等等。他把這些統稱為“我的雜學”。以上種種確實是周作人的專長，充分反映出他的博學。他在總結自己的雜學時，這樣寫道：

“……總結起來看過一遍，把我雜覽的大概簡略的說了，還沒有什麼自己誇贊的地方，要說句好話，只能批八個字云，國文尚通，常識略具而已。我從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樣影響，分析起來，大旨如上邊說過，在知與情兩面分別承受西洋與日本的影響為多，意的方面則純是中國的，不但未受外來感化而發生變動，還一直以此為標準，去酌量容納異國的影響。這個我向來稱之曰儒家精神，雖然似乎有點籠統，與漢以後尤其是宋以後的儒

教顯有不同，但為得表示中國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為根本的那種人生觀，利用這個名稱殆無不可。我想神農大禹的傳說就從這裏發生，積極方面有墨子與商韓兩路，消極方面有莊楊一路，孔孟站在中間，想要適宜的進行，這平凡而難實現的理想我覺得很有意思。以前屢次自號儒家者即由於此……

……我說儒家總是從大禹講起，即因為他實行道義之事功化，是實現儒家理想的人。近來我曾說，中國現今緊要的事有兩件，一是倫理之自然化，二是道義之事功化。前者是根據現代人類的知識調整中國固有的思想，後者是實踐自己所有的思想適應中國現在的需要，都是很必要的事。此即是我雜學之歸結點，以前種種說話，無論怎麼的直說曲說，正說反說，歸根結底的意見還只在此，就只是表現得不充足，恐怕讀者一時抓不住要領，所以在這裏贅說一句。我平常不喜歡拉長了面孔說話，這回無端寫了兩萬多字，正經也就枯燥，彷彿招供似的文章，自己覺得不但不滿而且也無謂。這樣一個思想徑路的簡略地圖，我想只足供給要攻擊我的人，知悉我的據點所在，用作進攻的參考與準備，若是對於我的友人這大概是有什麼用處的。寫到這裏，我忽然想到，這篇文章的題目應該題作「愚人的自白」才好，只可惜前文已經發表，來不及再改正了”。

他在這裏再一次強調了“倫理之自然化”與“道義之事功化”的觀點，並表示自己有“容納”的儒家精神。他說寫這些反映自己思想徑路的介紹文章，目的是為了提供給攻擊他的人，讓他們做進攻前的參攷準備。這頗帶挑戰性的話，我想是寫給日本的片岡鐵兵和當時在北京的幾個追隨者看的，周作人的意思是：這些攻擊他的人，在學識上還遠不够資格，你們先多看看這些書吧！他的作為教師和散文家的冷峻的幽默，就是在這樣的文章中也時有流露。

這段時間周作人還寫了一篇〈文抄序〉，發表在第五十四期的〈古今半月刊〉上。這是應文載道請求為其小品隨筆集〈文抄〉所寫的序言，文章一開頭他就這樣寫道：“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件發生，中國文化界遭逢一回大難，就我們所知道的說來，黃河以及長江兩岸的各地當時一切文化活動全都停止，文藝界的烟消火滅似的情形是大家熟知的最好的例。這是當然的。……要說恢復也還是很遠”。接着他提出了“閒適可以分作兩種。一是安樂時的閒適，……一是憂患時的閒適”，並巧妙地引用武者小路實篤小說〈黎明〉中的說法：“這個年頭兒是不是可以畫着這樣的畫？可是，不然的話，做什麼好呢？像我這樣的人，豈不是除了拿着誠實無匹的心情來作畫以外沒有辦法的麼？”在這篇序言中，周作人的隱衷是顯而易見的，他對中國文壇的憂患與自己心情的灰暗，都在此表現出來了。

周作人在〈古今半月刊〉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是〈女人的文章〉。他引經據典地強調情與理，指出文章不問是女人或男人所寫，只要是“為了自己所要說的事情與意思而寫，把人家的義理與聲調暫擱在一旁，這樣寫下來的東西我想總有可取的”。“人家的義理與聲調”是什麼？“人家”是誰？回想當時的政治形勢也許併不難理解吧！

總之，周作人在〈古今〉雜誌上發表的這些文章，是值得我們認真地去好好分析研究的，特別是在他督辦下野之後，他再三強調“民不聊生”，“為人民為天下”，中國在文化上“沒有被打倒過”，絕口不提“大東亞戰爭”；鼓吹儒家思想中心論，在文章中完全不按占領者規定的框框說話，所有這些都是應該引起我們的研究者注意的。至於他在任僞職時的那些例行公事的各種講話，我認為大都出於秘書之手，因為從周作人日記中，我們很難找到他某天寫什麼講話

稿的記錄。這些講話稿應該和他自己寫的散文區別開來，不同對待的。如果不加分析，籠統地說他此時的散文完全進入“藝術的衰敗期”，恐怕是太失之簡單了。我很同意錢理群先生的分析，他說：“盡管周作人自身民族意識已經淡化，但作為中國知識份子，周作人卻又不能不承受中國源深流長的愛國主義，民族主義傳統的強大心理壓力。按照這一傳統，周作人與敵人合作的歷史只能是屈辱的，不光榮的罪惡的堆砌，周作人在心靈深處越是拒絕這一歷史評價，越是不能擺脫牠所造成的陰影……”^⑧這種屈辱作為周作人自己，可能感覺得越來越強烈；那種心靈深處的痛苦，在他此時期的散文中，不可能沒有表露。從他在〈古今〉上發表的文章中，我們能够清楚地看到這一點。

三 周作人與〈古今〉之關係

周作人與〈古今〉的關係是從發表〈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序〉一文開始的，這樣他也便和〈古今〉社長朱樸有了聯係。〈古今〉創刊以後，非常注意拉北方作家的稿件，這可能是為增強刊物的全國性，以提高身份。朱樸曾在一次茶會上表示：“目前能徵得北方作家的稿件的似以古今為最多，如知堂老人，……他們不但為古今盡了許多力，即在文苑中的聲望學力也都是一時之選，如能請他們‘躬與其盛’，興趣就格外要增添不少。而且其中大部分的籍貫原在南方”^⑨。周作人是當時的散文大家和名家，〈古今〉雜誌當然要拉他的稿件來提高刊物的知名度和權威性、學術性；同樣也正是因為〈古今〉是南方偽組織的重要刊物，周作人纔給他寫稿，為自己尋找靠山和在不自由的環境中說點自由話的機會。因為這樣可以使他在北方少找麻煩，後來的“反動老作家”事件便是証明，如果沒有南方偽組織做靠山，依周作人的性格而論，他是絕不敢把事態搞大的。當然他的文章也正是〈古今〉所求之不得的，正如一篇文章所說：“到了去年，古今半月刊又在朱周二公主持之下出版，漸漸看到幾位睽違良久的北方作者文字，這是古今值得誇耀的特色之一。而且，這些作者多數的原籍還在南方。其中先後南下的如知堂老人，……等，無論在京或海方面，早已給讀者有很深的印象，自無待區區煩言了”^⑩。從〈古今〉中發表的朱樸的文章來看，周作人與〈古今〉編者有兩年多的通信往來，這些信件大部分與周作人的寄稿有關，可惜的是在〈古今〉上發表或披露的不多，不然我們可以看得更加透徹。朱樸有一則日記，錄用了周作人的部分來信：

十二月十八日

得知堂老人書，中有云：「弟昔見杜牧之句：忍過事堪喜；以為此公尚有事須忍，何況我輩？古人云：毋我負人，寧人負我。下一句尚不能做到，唯上一句極想努力。只盡其在我，餘只好不計耳。質之高明，以為何如？」句句金石，堪以懸諸座右也。老人信末復蓋有「忍過事堪喜」章一，古色古香，尤饒韻味。

知堂老人士林重望，著作等身，一士先生熟悉掌故，南北一人，其文字久為國內讀者所崇仰，年來對於古今贊助尤力，公私同感。不佞與二先生雖俱為神交，但辱承不棄，時以教言見賜，獲益匪淺，予以益見北方學者敦厚樸實之風，遠非南中囂張淺薄輩之可比矣^⑪。

此時正值周作人思想的苦悶期，所以他從佛教的“忍”和中國古典詩詞中的“忍”來尋找精神寄托，這封殘信也是一個有力的証明。

周作人與朱樸的最後一封通信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，朱樸在〈小休辭〉中，說了這封信的意思。由於朱樸意志益形消沉，到了就連辦〈古今〉也感覺到厭倦的程度，他的朋友們大為驚異，說〈古今〉如果停辦，未免太可惜了，希望他不要如此消極。他在介紹了這些情況後寫道：“還有一位是知堂老人，前天來信說古今停刊後他從此也不想再寫文章了，如此志同道合，真可稱得是古今的生死知己了”^⑫。說不寫文章了大概是假話，但失去了一個專門發表有刺文章的地方確是實情。愈是在不自由的情況下，周作人愈是要爭取一點小自由，這可能更符合五四時期那一代知識份子的特色。但周作人爲了在日據時期的北京爭取一點小自由，他和南方偽組織的關係卻愈陷愈深了，豈不知汪偽政權也是日本軍閥的傀儡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文學上的“精”掩蓋了他政治上的“昏”。不過，周作人到底是周作人，〈古今〉雜誌出版一周年、兩周年，以及朱樸結婚等事情，在〈古今半月刊〉裏出現的大量媚俗的文章中，我沒有找到他的名字和文章，他的這種俗中見雅的特徵是很值得研究的。

周作人與〈古今〉中關係最密切的第二個人是文載道。文載道在古今社中雖屬幫忙性質的小夥計身份，但他的散文寫得好，在風格上追求周作人式的清淡，再加之他和朱樸等人關係不錯，許多通訊式的文章都是由他執筆，因此從他的文章中人們可以發現不少史料。在〈古今半月刊〉第二十七、二十八期合刊與第二十九期上，連載了文載道寫的〈京海篇——南北的文人與風土〉一文，作者在文中大談中國現代的京派與海派文人。這篇文章值得注意處在於：不論是談南北作家或南北風土，都是以周作人的觀點來論述的，而且提到周作人的地方在文中到處可見，引用的周作人文章也不少。如果說此文是一篇周作人散文（主要是周作人讀明清筆記之類的散文）的導讀，可能也不能說太過。

一九四三年的冬天，文載道爲出版〈文抄〉一書，給周作人寫信，請求周給也的書作序，不久便收到了周的回信，他摘抄的一部分如下：

「丁丑以後文選未知所收內容大抵爲何，如將來承寄示目錄，（原文可從略以免寄遞有誤）當就所知寫序或跋寄奉。昔日曾言寫序跋以不切題爲原則，恐亦未能出此例外，尚祈勿詫責爲幸。」

這封信下署“十二月六日夜”，當時文載道的書稿正在與出版商接洽，爲了便於出書，想請周作人爲他寫一篇序言，以上便是周作人對寫序言的看法。因文載道知道當時北平的新民書館對散文等作品的出版頗爲努力，並有藝文小叢書印行，而且此時周作人的散文也由該館出版，周作人還兼任藝文社的名義社長，既然周已答應寫序，就索性提出第二步的要求，向周作人商請出版的事了。這樣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又收到了周作人的覆信：

「藝文雜誌只由鄙人掛名，實際編輯係由傅（芸子）尤（炳圻）二君主之，如能賜予文稿，至感佳惠。寒假中尤君或將南行省親，順便至京滬一帶接洽『拉稿』，屆時如蒙賜晤談，尤幸。大集如可交此間刊行，可以盡力。藝文社近有藝文叢書（書房一角爲第一冊）之計劃（書冊大小形式一律而已，此外無什麼限制也），加入其中最爲方更。但如願單行亦可代爲交涉出版，條件不十分佳，大抵贈書只是十或五冊，版稅以百之十爲原則，唯當於出版時一總算清，較別處零星計算者稍爲省事耳。書名擬定示知，容先爲說定，明春該印書館之安藤氏或將與尤君同行南下，其時再當面一談，或更佳也。匆匆不盡。十二，廿五，燈下。」

據文載道說：“這封信的開頭，抄時約略去三四十言，其下則照錄到底”^⑬。從這封信中，我們亦可以看出當時北平的偽出版界也是在日軍的控製之下，這個“安藤”氏便是證明。翌年

一月十二日，文又接到周作人的來信說：“尊著似可就性質近似者編為一集，另交藝文叢書付刊，序文自當盡力，一切辦法可請就近與尤君面商……（大約十五日啓行）”尤炳圻到南方後，文的書稿並未編完，一直拖到三月文載道纔把書稿編完，並以郵包寄至苦雨齋，由此可見他對周作人的信任程度。後來文又收到周作人的兩封信：

「啓者，前寄上雜文一冊，想已蒙收入矣。大稿已收到轉交去，併偷閒拜讀一部分，預備寫序，而一時文思枯澀，雖欲做不切題的文章亦復大難，容暫歇幾日，待湊得起若干字時，當即下筆也。三，廿一。」

「啓者，手書誦悉，致尤君信亦即已送交矣。文抄序文早想着筆，而屬想未就，未敢草率從事，容再緩幾日。書局印刷恐不能快，因工人現取半怠工態度。……但尤君能時加督促亦不至十分太遲。拙集將予以批評，甚感荷，以先觀為快。匆匆。四月十三日。」

直到八月八日周作人纔把序文寫完，這其中雖有日偽時期“工人現取半怠工態度”，印刷甚慢，周作人不用着急之說；但數月來周作人醞釀序文，在文中巧妙地表達了自己的意思，也占去了不少時間，真可謂用心良苦。由於此序文在本文第二部分中已有專門分析，這裏容從略。

從全部《古今》雜誌認真看來，《古今》對周作人的重視程度可謂超高規格的，也許他們認為這是“開發北方”^⑭的最大成績吧。周作人南行過後，《古今半月刊》連發了紀果庵寫的《知堂先生南來印象追記》，《知堂老人南遊記事詩》等文。一九四三年四月出版的一冊《古今半月刊》中，就有南冠寫的《讀〈藥堂語錄〉》，和陶亢德寫的《知堂與鼎堂》等三篇文章，當然這前後也還陸續發表過一些評論文章。《古今》^⑮第五期還在封二上發表了周作人南遊的三張活動照片和一幅墨跡，題為《周作人先生南游圖輯》。周作人是繼汪精衛，周佛海之後，能在《古今》上享此“殊榮”的第一人，因為《古今》本來發表的書法原稿就少，照片就更少，可見對周作人的重視程度絕非一般。

時。周知堂先生之文，不見於南中刊物者，已歷多
一文。此次特應本刊之請，允長期惠稿，「憶廢名」
讀者密切注意出版日期。

憶廢名……………周作人

下期本刊特稿（四月十六日出版）

再有就是，對周作人文章的重視程度也是與眾不同的。如先發表預告，文章刊載後還要在《編輯後記》中強調它的重要性。我們不妨以《懷廢名》一文為例，看看編輯心態：

《懷廢名》發表於一九四三年四月出版的《古今半月刊》第二十，二十一期合刊上。可是在三月中旬的“周年紀念特大號”上，就發表了這樣的一則廣告：（見左圖）

有意思的是：對這樣一個廣告，編者還耽心有人看不到，在本期的《編輯後記》結尾，又寫了如下的一段話：

“臨末尚有一好消息報告，即下期本刊有周作人先生之特撰名文——《憶廢名》（此文正式發表時用的題目是《懷廢名》）發表，此舉讀者渴望已久，務祈密切注意”。

下一期便在首頁上發表了周作人的《懷廢

名》。在這期的〈編輯後記〉上，編者一開頭便寫了這樣一段話：

『周作人先生的文章，不見於南中刊物者，已歷有年所，此次慨允為古今撰文，全出先生至誠，初非其他可比，讀者只要一看本期的題目，便知如當年老譚貼定軍山，決不是泛泛之作也。此文發表日，適為先生戰後再度南游，事前編者曾函約來滬一游，未蒙允諾，而編者又偶撷小恙，未能去京拜謁，殊為根觸。乃約去歲負招待之責者紀果庵先生撰為南游印象追記。適南冠先生有『讀藥堂語錄』存稿，又得陶亢德先生記先生與郭沫若之文，四篇拚在一起，幾成先生的特輯。果庵曾侍先生講席，南冠又私淑先生，亢德於執筆時雖尚未與先生謀面，但關係之深，十年如一日，這幾篇文章，當然都不會差到那裏去了的。』

真可謂受寵若驚，可以想像當時給敵偽雜誌寫稿的有名作家寥寥無幾，他們在文學方面只有靠拉周作人來裝飾門面。周作人的文章雖然寫得不慢，但必竟是一人兩手，來得也不容易，所以就顯得十足“珍貴”了。此後發表的〈我的雜學〉也是同樣，數次在〈編輯後記〉中提及，因為篇幅的關係，我就不在此再舉例了。

周作人與〈古今〉雜誌的關係，是研究抗戰時期周作人文學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。從他發表的文章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墮落與昏瞶，苦悶與煩惱，傷感與憤激，個性與聰敏，空虛與懷舊……。周作人在〈古今〉雜誌發表的文章，與他同時期發表的其他文章比較起來看，我以為是很有代表性的，也可以說是抗戰時期周作人文學活動的一個縮影。透過這些文章的研究，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思想感情，精神世界和藝術追求。通過周作人與〈古今〉雜誌的研究，也許能夠使我們找到一把鑰匙，以便打開周作人靈魂深處那扇沉重的大門，達到窺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。這對於認真嚴肅地展開抗戰時期的周作人研究，無疑是必要的。

註 釋

- ① 朱樸：〈古今一年〉，見〈古今半月刊〉（周年紀念特大號），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。
- ② 朱樸：〈漫談古今〉，見〈古今月刊〉第二期，一九四二年四月。
- ③ 周作人：〈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序〉，見〈古今月刊〉第四期，一九四二年六月。
- ④ 見〈華北政務委員會各總署督辦素描〉，〈新民報〉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。
- ⑤ 加藤將之：〈做為督辦的周先生〉，見方紀生編〈周作人先生的事〉，光風館，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。
- ⑥ 谷崎潤一郎：〈冷靜與幽閒〉，見方紀生編〈周作人先生的事〉，光風館，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。
- ⑦ 周作人：〈遇狼的故事〉，見〈古今半月刊〉第四十五期，一九四四年四月十六日。
- ⑧ 錢理群：〈周作人傳〉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，一九九〇年九月第一版，第四八二至四八三頁。
- ⑨ 文戰道：〈模稜雅集記〉，〈古今半月刊〉第二十五期，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。
- ⑩ 文戰道：〈京海篇〉，〈古今半月刊〉，第二十七，八期台刊，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。
- ⑪ 朱樸：〈小病日記〉，〈古今半月刊〉第三十九期，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。
- ⑫ 朱樸：〈小休辭〉，〈古今半月刊〉第五十七期，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六日。
- ⑬ 文戰道：〈關於〈文抄〉及〈風土小記〉〉，〈古今半月刊〉第四十八期，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。
- ⑭ 周黎庵：〈古今兩年〉，〈古今半月刊〉第四十三，四十四期合刊，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。
- ⑮ 本文所引〈古今〉雜誌之文章出處，在第九期以前者均用“〈古今〉”以表示月刊；第九期以後該雜誌改為半月刊，本文便注明“〈古今半月刊〉”，特此說明。